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

——以大理白族为例

张海超

摘要：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关键词： 民族史；民族融合；族群认同；白族；历史人类学

如何妥善处理境内诸多族群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代政府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虽然没能彻底解决族群争端，但数千年来处理族群问题积累的丰富经验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与其他伟大文明相比，古代中国解决族群问题的方式即使不是最好的，肯定也是最好的之一。虽然不敢轻言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古老智慧潜藏着拯救这个深受民族主义之害的世界的特效药，但善择善用先哲遗泽无疑也是这个时代的学者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本文以白族为例，分析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实施对大理白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尝试对古代中国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的一般过程进行初步讨论。

一、僰人、白人与民家：

“他者”身份的逐渐退却

僰人是一个很早就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古老族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的学者们都习惯用僰人一词来称呼生活在大理地区的某一部分人群。明清之后，改土归流和大量驻军的进入深刻地影响到当地文化的走向，白人与民家先后成为官方文献对白族先民更常使用的称谓，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被视为“遵纪守法”的民众典范，这与同处云贵区域但让明清政府焦头烂额的群体比如倮倮、苗瑶等有很大区别。本文并非要对大理白族的历史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而是试

图讨论在众多的历史文本中，不同的作者如何看待从僰人到民家的古代大理白族的“他者”身份转化，这其中显然隐藏着一条身份变迁的伏线。

或许出于对文献的尊重，古代的学者们很少考虑在漫长的历史中少数族裔人群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被沿用的称谓可能会被用在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身上，甚至是同一时期，“僰”都可能被用来指代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集团。对此，古代知识界未尝没有反思，而显然更加了解本地情况的地方学者正是其中的主力，他们很早便提出自己的质疑。《天启滇志》指出“然夷繁有徒，彙括未尽，又古今变殊，有名实刺谬，未免牵合附会者”^①其附录的《种人》条将白人从僰人中分出来，认为它们是“古白国之支流也。旧讹僰为白，遂称一类，实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庶几一变至道者矣”。^②“白”有时被认为是“僰”的异写，蒙古攻灭大理国后派驻云南的官员李京就特别论证了“白人之为僰人，明矣”。但《天启滇志》的作者显然并不同意元人的观点，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对僰夷进行描述，并将其分布于不同地区支系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对“白人”与“僰夷”进行区分。明成化前后，川南一带的“僰人”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白族‘冒籍江南’的历史人类学探讨——兼论古代中国的族群认同”

作者简介：张海超，云南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云南昆明，650091）。

①刘文征《天启滇志·羈縻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②刘文征《天启滇志·羈縻志》，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遭到大规模的征讨，这也让云南本土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于将白人与这个本来就没有多少联系的族群划清界限。大理本地著名学者李元阳便将这个称谓推给生活于更遥远区域的“僰夷”——今天傣族的先民，这一观点显然也影响到后来很多志书作者的看法，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新的记录传统。

与僰人这个古老称谓相比，“民家”出现较晚，大概乾隆年间前后才出现在志书中。明代大规模的屯军移民使大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保持着军民分立的二元社会，彼此生活的区域被隔离，其间严格的界限不容打破，甚至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首先都要明确自己的户籍归属。除了与“军家”相对外，“民家”一词其实也是有意与周围的少数民族进行切割，在洱海盆地的边缘其实还生活着如今被划为彝族的若干族群，洱源县西山等地现在属于白族的人们以前也不被认为属于“民家”，大理盆地的白族肯定不愿与之混同，在某种程度上说，民家这一称谓实际也是在否认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尽管可能需要缴纳更多赋税，大理白族显然更倾向认同自己是“民”而非“夷人”，民家称谓的背后显然还有这一层意思。

一般说来，生活在洱海两岸的民家人十分热衷接受“正统文化”的教育，逐渐接受儒家提倡的各种生活规范，考取功名的人数在省内长期领先，地方风俗也以“忠孝节义”为尚，这部分人是很容易被外来的汉人引为同类的。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方志记载的白人分布区域在朝偏僻的山林中退却，于是便认定这是政府将其驱赶到偏远地区。考虑到今天白族的分布情况，这种记载更有可能是靠近城市的居民被逐渐纳入“民”的群体中，不再被知识分子视为野蛮人群而已。官方统计是把他们当做“民”还是归入带有“他者”意味的“种人”一类，确有仔细斟酌的必要。

二、大理地区民族融合的过程及方向

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人们总是希望把它描绘得古老而且血统纯粹，尽管这可能是和历史真实相悖离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外来移民落籍丰饶秀丽的大理的情况都在不断发生着。目前看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已认识到，就像不存

在纯正汉人一样，并不存在纯粹的白人，但承认白族血统上具有多元来源并未将问题彻底解决，在叙述当前的某种文化现象时，学者们往往习惯性地回到史前的西北地区去寻找根源。这种解释背后实际上仍以传统的氏羌论为底子。如今历史学界对明清两代大理的人口构成其实已经有了两个共识：一方面认为外来汉族移民的数量巨大，古代文献和现在学者的研究都说明汉族人口的数量可能已超过原住民，而且大家都同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移民最终成为被融合的对象，外来人口大多成为白族。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时候，费孝通先生便专门举了白族的例子，“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也都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①在大量人口混居的情况下，民族融合或者说文化涵化的发生也是必然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判断新生成的文化是朝当地人的方向发生的，而不是相反？本地人向外来的汉文化靠拢的现象肯定也同时存在，在一定的情况下，后者也有可能成为主流的趋势。即使认为外来的汉移民融入当地人中，这个新形成的群体注定也会部分改变甚至放弃很多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他们的后代组成了今天被称为白族的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明白，很多的论述实际是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做出的，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移民和原住民确实有融为一体的趋势，不过人类学研究证明“涵化过程的取向是受相互交往的群体的性质和规模制约的”。^②检索明清时期的云南古籍，我们便能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明代尚记载有僰人分布的地区，如今晋宁、寻甸等地，清代之后有关他们的记录便逐渐消失不见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留下了他们遵从汉人习俗并逐渐失去自己语言的线索。就后来的观察者看来，他们的风俗与当地汉人是如此接近，根本没有另外列为一类的必要，作为单独族群在文献中销匿也是必然的。就僰人居住的中心地大理而言，各类文献也是众口一词，都认为僰人由于受汉族人习惯的熏染，已经和汉族人十分接近了。杜赞奇早就提醒我们“地域性的现代民族和线性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③面对同样的史实，当代学者的论述和古代学者的观察存在很大的矛盾，而我们似乎首先应该相信古人更加接近他们的时代，对当时的情况也最为了解。大理地

①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②[黎巴嫩]萨利姆·阿布《文化认同性的变形》，萧俊明译，载《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页。

③[美]杜赞奇《本真性的秩序：超时间、性别以及现代中国的民族史》，载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8页。

区的原住民确实在当代获得了独立的白族身份，但今天的学者们必须警惕自己对历史变迁方向的判断是否受到了现实情况的影响。

对于古代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我们似乎不能凭借人类学家仿佛超然的立场来臆断。有学者敏锐地发现，越到后来地方志中对白人居住区域的记载越少，“白人在康熙年间与汉人杂居，到了清末就被说成地处偏僻山区了”^①，但这可能仅仅是人们心目中的族群边界发生变动所致，同样还是那群人的后裔，如果已被视为汉人，自然无需特别记载，就如台湾的平埔族曾消失在汉人中一样。费孝通等学者曾论证过，因为周围族裔被不断地吸纳进来，汉族人口得以不断扩大，类似过程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始终都未停止。如果将滚雪球般扩大的不只看作是汉族，而是依附这套文明传统的人群，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明代的大理和平地推行了流官治理，白族的先民开始被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中，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参加科举考试，个人与家庭努力争取最有利的地位，而整个群体嵌合到国家统一结构中的程度也就越来越深，此种情形继续发展，直到民国时代，中国早期杰出的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直接将喜洲镇描述为汉人社区的典型。实际上，将大理坝子的居民理解为汉人，许烺光先生绝对不是最早的，晚清的杜文秀起义对大理的经济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记载中白族几乎都是缺位的，当时的作者们实际上都认为除了回族之外，当地只有一种居民。不言而喻，他们都是汉人。需要特别指明的是，白族在正式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之前，大理当地的文书档案上都是直接填注汉族的。

三、古代中国族群关系的特殊性

中国的情形显然和世界其他地区很不同，相对宽容的环境准许民族身份和认同发生改变。应该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文献关于大理白族的身份都维持着汉与非汉两可间的状态。这种暧昧不明和“归属的不确定”之所以在某个时段能够存在，是因为当时学者们更看重的是当地人是否按照儒家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行事。我们并不否认古代中国对少数民族歧视的存在，但相对于印度、日本和欧洲，传统中国社会仍然算是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结构，而我们也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认同变化视为一个调整与再定位的过

程。

彝人始终是个边缘性的群体，经过漫长的时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地转变为“民”的彝人，民家成为清代之后对他们的新称谓。虽然不时有渊博的学者指出其“异质性”的存在，但他们无法否认这个族群追求“文明”的努力以及数百年来当地社会的深刻变化。总的趋势是明清之后大理的社会与文化确实在朝着帝国认可的方向迅速发展，尤其是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和科举出仕的追求，使大理和汉人的地方社会在结构上不存在任何本质性的区别，学者们都承认他们的生活与中原的文明人群趋于一致。当然，即使数量和区域都呈缩小之势，仍有一部分人被认为是在“民”的范畴之外的，此外，古代文献的存在始终暗示他们血统不够纯洁。按照汉文化的传统，大理白族人民需要不断证明自己出身清楚，这应该是康熙之后大理地区大量制作家谱并宣称祖先来自“南京”的推动力之一。^②

总之，大理地区居民身上的“他者”身份在不断退减，而且有无限接近汉人的趋势。前辈的研究早就证明，在白族主要聚居的洱海区，“大量汉族人口迁来以后，汉族经济文化与原著各族相互影响，以致不能分别，于是族别也起了改变”^③，于是大理白族人的家谱和口头传说都会强调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和江南，这种说法可能是从那些驻军家庭的后裔中产生并最终广泛流传的。家谱的制作产生了一种以姓氏为单位的继嗣群认同，原来的同一群体因为异姓问题反而出现一种互相区别的张力，族群认同难免会逐渐消解。另一方面，家谱总体上又倾向于让人们相信自己跟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原来的地方大姓如段、董等家族的家谱中都与华夏的英雄祖先攀上了关系，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对汉族身份的渴望。

因为很早就有了清晰的夷夏之辨，很多西方学者喜欢用种族沙文主义来定义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方式。早期学者的研究显然忽视了这个国家很早就倾向于将所有的人群都纳入一个统一的架构中的传统。“征服”与“反抗”的解释范式用于中世纪的欧洲或许可行，但将其投射于中国古代的族群政治显然不够妥当。相对于文艺复兴后西欧人群间的界限分明，传统中国社会是开放式的，基本不存在那种所谓“冻结的社会位阶”，边缘人群仍有很多被纳入中心的机会。如今致力

①梁永佳 《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9~70页。

②张海超 《祖籍、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变迁——大理白族古代家谱的历史人类学释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③方国瑜 《方国瑜文集》第3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在朝多元族群社会迈进，但古代中国并非以此为追求，而是希望用一套共享的文化体系，为所有人提供文明的范例。中国古代确实有根深蒂固的“民”与“化外之民”的区别，但在对少数族裔进行记录和描述的时候，往往会将同一族群细分为“生”和“熟”两部分。“生番”、“生苗”社会哪怕不久之前还被描述为“与禽兽无异”，但可能在仅仅数十年后会朝“熟”转化，而原来与汉人接触很多的“熟番”最终会在记录中消失，成为化内的人群，这个过程在边疆少数民族区域从未停止过。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民族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列宁、斯大林的有关学说在中国影响深远，尤其是后者关于民族的定义，更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重要的参考标准。近年来受西欧和美国学术的影响，族群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人类学界持久不衰，国内学界基本接受了西方的有关学说，并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各地人群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西方的族群理论未必可以合适地套在中国民族的身上。无论如何，民族都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组建此类“想象的共同体”，需要依靠一系列的外部条件，比如媒体的宣传、可以凝结人群的符号等等，在前现代社会这些条件都不可能具备。现在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具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古代生活在中国边疆的族群不可能都具有明确的民族归属意识。同理，族群认同也并非中国固有的概念，无论是“原生情感”还是“现代建构”，都无法全面地反映古代中国的事实。应该承认，当下中国的人类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些从西方引进的观念和术语上，而这套知识体系中能真正贴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并不多。中国的民族研究曾经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视野，遗憾的是，如今它们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广受关注。只要我们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加诸其上，也许就能发现，那些看来已过时的话题比如民族融合等也有其特殊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海外汉学家们的态度似乎可资参考：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①

四、总结与反思

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认同都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一个享有完全权力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的民众从来不用为个体的身份焦虑。分析各处方志的记录便可以发现，传统社会实际上发展出一种容忍和承认文化差异的格局，人们将其解释为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造成不同地区的人民勤奋、正直亦或吝啬、好争讼等特点，但这并不妨碍把大家整合入更大范围的统一中。在帝国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社会也在缓慢但持续地变化着，国家鼓励定居和农耕的生产方式、编户齐民的税收政策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书院、科举这些文化制度上的举措，使很多少数民族发生了文明观念和身份认同的巨大变化。从上层精英逐渐波及普通民众，新的社会秩序沿着特定的方向被逐步建立起来，从传世的文献记录上，我们也能看到每一步改变的发生。很多对于中国边缘族群的研究都能表明，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群社区对地域范围和身份认同的诠释也在改变”^②长此以往，身份的阻隔会被逐步突破，原来少数民族的后裔最终也会融入汉人群体。

作为“现代知识”的发源地，欧洲文化在民族国家兴起后普遍发展出一种对身份的关注，人们努力寻找个体进而延伸到群体存在的意义，人群间的差异和边界被不断强调甚至建构出来，所谓“认同危机”也一时难以消除。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潮深深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后来的发展。在采用欧美的学说作为分析工具时，我们似乎首先应该考虑到问题的普世性，西方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内容，在其他地区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样态和程度存在着？很多对前现代社会进行研究的民族志材料都证明，当地文化并不一定特别热衷追问个体存在的意义。路易·杜蒙在印度开展的著名研究，实际上也是在利用东方的个案挑战欧洲奉为圭臬的个体主义至上的传统认识论基础。同理，欧洲式的认同焦虑不能直接推及古代中国，大理地区的案例更是证明白人与汉人之间的族群界限是可以被跨越的，今天的研究者对古代的“异族身份”太过执著也是不恰当的。

（责任编辑 廖国强）

①[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1页。

②蔡志祥《香港长洲的神庙、社区与族群关系》，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